

1955 年亚非会议与中泰关系的改善

Kampol Piyasirikul¹

提要

本文主要探讨的是 1955 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市召开的亚非会议对中泰关系的改善所起的作用。此次会议确实为中泰两国提供了一个直接接触和互相了解的对话平台，由此，会后中泰关系有了好转的势头。但是由于泰国政权的更迭，反华政策重新出台，中泰关系的缓和不得不暂时告一段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力求有所突破，不仅利用了中方的史料，而且特别挖掘了罕见的泰国外交部档案馆所藏的有关档案。根据该档案的内容，笔者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以填补以往研究的空白点。

¹ Lecturer, Chinese Section,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Mae Fah Luang University

一、冷战与中泰关系

二战后，全世界处于冷战状态，主要分成两个大阵营，即以苏联为首的奉行社会主义的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奉行自由主义的阵营。在亚洲冷战的背景下，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领导人选择了与苏联结盟的道路。苏联曾经向中国提供许多物质与精神的援助。中国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使其同周边社会主义国家，如蒙古、朝鲜、越南等，结成盟友，有利于新中国维护其安全、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但是，同时“中国也通过自己积极和灵活的外交行动，打开了同其中周边一些中立国家的关系”。五十年代，经过双方谈判，中国先后同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斯里兰卡、柬埔寨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²

² 张小明：《冷战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特点》，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年，第 3-4、7-8 页。

新中国成立后，泰国政府并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北京政权，而一直保持与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关系。1948-1957 年，泰国政权重新掌握在銮披汶元帅手中。泰国军政府选择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阵营。出于与乃炮警上将和沙里上将两个政治大集团的权力抗衡的考量，銮披汶元帅积极采取“一边倒”的亲美政策。从而，美国向泰国提供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的许多援助。³ 于是，披汶军政府开始在国内实行反共政策，主要表现在袭击华人学校和社团、逮捕华人劳工机构领导人等。1950 年，泰国政府宣布承认南越保大傀儡政府。朝鲜战争爆发后，泰国派遣士兵增援南韩。1954 年，泰国参加了以抵抗共产主义为宗旨的东南亚条约组织。⁴ 在亚洲冷战的这种紧张的国际背景下，中泰关系长期处于隔阂状况，双方互相猜疑，缺乏直接接触和了解的对话平台。

³ [泰] 碧雅娜·汶纳：《泰国现代史：从鲍令条约到“1973 年 10 月 14 日事件”》，统一设计出版社，2007 年，第 9 章。

⁴ 张锡镇：《中泰关系四十年》，《东南亚研究》，1990 年第 2 期。

二、亚非会议的概况

亚非会议于 1955 年 4 月 18-24 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市召开。它是由印度、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缅甸及印度尼西亚等五个发起国的总理相继于 1954 年 4 月与 12 月在锡兰科伦坡与印尼茂物集会，通过决议的产物。与会国共有二十九个亚洲与非洲的国家。除上述五个发起国外，有土耳其、伊拉克、菲律宾、泰国、日本、南越、伊朗、约旦、黎巴嫩、利比亚、利比里亚、黄金海岸、苏丹、阿富汗、老挝、柬埔寨、尼泊尔、埃及、沙特阿拉伯、也门、叙利亚、埃塞俄比亚、中国和北越。亚非会议的宗旨有四条：“一、寻求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探讨和寻求彼此间的互利和共同利益，建立它们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二、讨论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三、讨论那些对亚非国家有特殊利害关系的问题，以及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问题；四、探讨亚非国家和人民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他们在促进世界和平

与合作方面能作出什么贡献。”⁵ 会议分成三个分组会议，即政治、经济和文化委员会会议。与会代表团都来自具有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所以他们能够到万隆来集聚一堂，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是抱着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愿望来的。许多代表团甚至互相没接触过，包括中国与泰国。而这次会议为他们搭起了直接交流的友谊桥梁。

三、中泰若干敏感问题的对话

在为期一周的亚非会议期间，各国代表团就许多问题争先抒发各自的见解。泰国代表团团长旺亲王也趁此机会提出涉及到新中国的若干敏感问题。在 4 月 19 日的代表团团长发言会上，旺亲王具体提到了三件事情，其中两件直接与中国有关。他说，引起泰国担心的三件事情是：一）中国云南省建立傣族自治区，使泰国不得不面对渗入和颠覆活动的威胁；二）

⁵ 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我的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 年，第 256 页。

泰国境内现有三百万华侨具有双重国籍；三）泰国东北部有五万逃难的越南人。⁶

从《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这份外交部解密的档案考察，中国代表团在参加会议前将泰国列入了反对“和平中立”的国家类型。文件指出，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中应该“孤立并分化”这类国家。但同时，他们认为在会外“应有重点地对各类国家进行工作，并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对泰国要“争取建立接触，产生一定影响”。⁷而从中方的史料出发，针对旺亲王所提出的傣族自治区与华侨双重国籍的问题，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一一作出了解答。

周恩来在代表团团长发言会上的其补充发言中，指出：“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有人说，中国在国外有一千多万华侨，可

⁶ 李慎之、张彦：《亚非会议日记：日内瓦会议通讯》，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第14页；[美]鲍大可著、弓乃文译：《周恩来在万隆——美记者鲍大可记亚非会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8、45页。

⁷ 《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藏于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载张伟：《从解密档案看新中国参加万隆会议的准备》，《百年潮》，2005年第5期。

能利用他们的双重国籍来进行颠覆活动。但是，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蒋介石至今还在利用极少数的华侨进行对所在国的破坏活动。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又有人说，在中国境内有傣族自治区威胁了别人。中国境内有几十种少数民族共四千多万人，其中傣族和相同系统的壮族将近千万人。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自治权利。好像缅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在中国境内各个少数民族都有他们的自治区。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实行自治权利，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4月23日，在政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周恩来对旺亲王强调指出，“在中泰两国建交以前，泰国也可以派代表团到中国的云南省来看看，特别是到傣族自治州去，看看中国有无向外侵略的意图。”⁸

⁸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23-124、131页。另参见《周恩来在万隆——美记者鲍大可记亚非会议》，第15、18、48页；文星星：《亚非会议纪实》，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73、95、98页。

关于泰国东北部的五万越南人的问题，周恩来安排了一次泰国代表与北越代表的会见。北越在原则上同意接受在泰国的五万越南难民。双方还同意互派联络团以便帮助这些人回国。⁹ 另外，会议期间周恩来还向旺亲王揭露左倾的泰国前总理乃比里因国内政变而逃往中国的消息。他指出，“现在在中国的泰国前总理乃比里住在北京而不是在云南。……中国不过是给乃比里以政治避难权，去年乃比里在广播中攻击泰国政府这件事是错误的，今后再也不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¹⁰

一位美国记者对中国代表团在亚非会议期间的外交表现有这样的评价。他说，“亚非会议给周恩来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来发挥自己的全部外交才能和个人魅力，去结交朋友和影响人们”。在许多场合上，周恩来对同中国接壤的几乎所有国家的代表都作了友好的保证和承诺。这位记者认为，周恩来作出的这种口实保证，是一种有效的做法，肯定给人家留

⁹ 《周恩来在万隆——美记者鲍大可记亚非会议》，第 18 页；《亚非会议纪实》，第 99 页。

¹⁰ 《周恩来在万隆——美记者鲍大可记亚非会议》，第 18 页。

下深刻的印象。“由于采取了和解的态度，周恩来赢得了相当大的好感，至少从中国周围的许多国家那里得到了一些信任。”他还这样判断说，“许多国家的领袖们在私下会见和正式宴会上彼此第一次接触，这些接触无疑会在许多微妙的方面影响他们的国家今后的政策。”¹¹

会议期间，旺亲王与周恩来在会内外进行了直接的交谈，促进了两国的互相了解。旺亲王对在万隆会见周恩来有一段回忆录指出，“周恩来对本人友善，邀请本人共进晚餐……翌日早晨给本人及内人送来礼物，我有个漆烟盒送给他作为回礼。”¹²旺亲王在和周恩来一次会谈后，向安塔拉通讯社记者揭露，“双方在会谈中已经产生了良好的了解”，他认为“应该重新考虑泰国的外交政策，以适应国际形势的

¹¹ 《周恩来在万隆——美记者鲍大可记亚非会议》，第 5、6、17、18、64、67 页。

¹² [泰] 旺亲王：《与周恩来在万隆会晤》，《沙兰隆杂志》，1975 年 2 月，载[泰]尊拉琪·钦万诺：《三十年泰中建交良友间合作情谊 1975-2005》，川频出版社，2005 年，第 9 页。

改变和发展”。¹³

已有研究更多强调的是中泰两国通过亚非会议取得了互相了解，消除了泰国对中国的若干敏感问题的疑虑。但从泰国外交部解密的档案考察，当时泰国代表团团长旺亲王对同周恩来交谈还是持比较谨慎的态度的，并给自己保留一定的空间。旺亲王后来在其《1955 年 5 月 1 日旺亲王与驻泰中华民国代办大使的谈话记录》中，提及他对周恩来邀请他到中国云南和北京去访问表示了拒绝。他指出，“关于训练人士对泰国进行渗透和骚扰活动的问题，周恩来说来万隆之前已经过云南，没看到有这种活动。如果我想亲自去看或者派代表团去看都可以。我已经拒绝了他的邀请，因为我说得参加国际会议，没时间。关于泰国境内华侨问题，周恩来说这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但与其政府有关的，他愿意以新中国和印尼签订的关于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为标准与我们谈判，即可以选国籍，如果选泰国国籍，他将不会去干涉，但如果选中国国籍，他将告诉他们不

¹³ 《亚非会议日记：日内瓦会议通讯》，第 39-40 页。

要去参与政治。周恩来还邀请我到北京去谈判，我说得先看新中国与印尼签订的条约。对于邀请到北京去访问一事，由于得参加国际会议，我已经表示拒绝。”¹⁴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者们一般只注意上述中泰若干敏感问题的对话，而其实除此之外，亚非会议期间中泰两国代表团团长还对释放美国航空人员问题和台湾问题进行了交谈。4月23日，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其住宅举行午宴，邀请缅甸、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中国、泰国等七国代表团团长参加。他们讨论的主题是台湾问题。旺亲王向周恩来提问，新中国是否愿意以和平方式同美国谈判以解决台湾问题？新中国是否愿意通过良友国家如印度或某些国家同美国谈判？周恩来回答说，如果他了解了美国的反应，并且美国愿意与其谈

¹⁴ [泰]《1955年5月1日旺亲王与驻泰中华民国代办大使的谈话记录》，《台湾卷》，POL2-6/2498，泰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判，那么谈判的形式可以再商量。¹⁵ 关于释放美国航空人员问题，旺亲王对周恩来表示，他受联合国秘书长的委托，向周提问新中国能否因顾人道而释放被捕的美国航空人员。周对此表示，在他们正在考虑释放这些人之际，就发生“克什米尔公主”号包机爆炸事件，引起了强烈反美的国内舆论。但若舆论平定下来了，周表示他会再考虑该问题的。¹⁶

四、会后中泰关系的改善

尽管在上述所提到的某些问题上，泰国的表现是持保留的态度的，但亚非会议确实向中泰两国提供了直接接触和了解的良机。事实证明，会后中泰两国领导人已抓住了两国关系改善的历史性的机遇。会后两国关系出现了暂时的好转。泰国总理銮披汶元帅开始试图改善同中国的紧张关系。是年 12 月，他派遣由

¹⁵ [泰]《印度尼西亚总理举行的中午宴会上的旺亲王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谈话记录》，《台湾卷》，POL2-6/2498，泰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¹⁶ [泰]《亚非会议期间旺亲王与驻印度尼西亚美国大使的谈话记录》，《台湾卷》，POL2-6/2498，泰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他亲信两人和议员两人组成的秘密使团到中国去访问。其主要目的是试图打开将来中泰关系正常化的道路。这组秘密使团被安排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当时毛泽东向他们表达了中国对泰国的诚意。他说，“我们要慢慢地、逐步的改进中泰关系。……这次你们来很好，以后有机会再来。我们也可以派人去你们那边访问，只要你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去；如果你们不方便，我们也可以不去。我们也不在你们国家讲共产主义，我们只讲和平共处，讲友好，讲做生意。”¹⁷ 对于泰共与华侨问题，毛也做出了解释和承诺。他指出，“你们国内也有共产党，我们也不去挑起他们来反对你们的政府。泰国有华侨，加入你们国籍的，就算泰国人了，没有加入泰国籍的才是中国人。要不华侨很多，人家会害怕。我们国外华侨的共产党组织也取消了，以消除华侨所在国政府的怀疑，使大家互相信任。”¹⁸

¹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29页。

¹⁸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30页。

1956-1957 年间，泰国民间各界人士陆续组成代表团到中国去访问，如记者团、企业团、文艺团等。中泰关系有了好转的势头。但好景不长，1958 年 10 月，沙里元帅发动政变，实行独裁，将军政实权掌握在其个人手中。他采取了极端的反共、反华的亲美政策。1959 年 1 月，他实行了对华禁运的革命集团令，并公布严禁泰国人赴华。至此，中泰关系自亚非会议以来的缓和不得不告一段落。

对于会后中泰关系缓和的局限，有学者们分析指出，主要原因是美国对泰国的政策始终没变，以及泰国当局也没放弃亲美反共的立场，甚至后来由于泰国政权的更迭，使泰国的亲美、反共、排华政策比以前更为严重。¹⁹ 而对这种缓和局面的出现，有学者认为主要因素有：一、周恩来在会上所发挥的外交家才能消除了一部分泰国政治家对中国的误解；二、泰国国内主张中立的势力日益壮大；三、泰国政权内部的

¹⁹ 参见《中泰关系四十年》；刘莲芬：《1955 年亚非会议与中泰关系的有限缓和》，《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 年 5 月第 15 卷第 3 期。

权力斗争。²⁰ 笔者认为还有一个因素也应该考虑在内，即当时美国正准备以大使级的形式同中国进行谈判。这使泰国当局不得不考虑改进中泰紧张关系，以顺应将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年。

李慎之、张彦：《亚非会议日记：日内瓦会议通讯》，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 年。

文星星：《亚非会议纪实》，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 年。

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我的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 年。

[美] 鲍大可著、弓乃文译：《周恩来在万隆——美记者鲍大可记亚非会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

²⁰ 参见《中泰关系四十年》。

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年。

张锡镇：《中泰关系四十年》，《东南亚研究》，
1990 年 第 2 期。

张伟：《从解密档案看新中国参加万隆会议的准备》，《百年潮》，2005 年第 5 期。

刘莲芬：《1955 年亚非会议与中泰关系的有限缓和》，《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 年 5 月第 15 卷第 3 期。

《1955 年 5 月 1 日旺亲王与驻泰中华民国代办大使的谈话记录》，《台湾卷》，POL2-6/2498，泰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印度尼西亚总理举行的中午宴会上的旺亲王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谈话记录》，《台湾卷》，POL2-6/2498，泰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亚非会议期间旺亲王与驻印度尼西亚美国大使的谈话记录》，《台湾卷》，POL2-6/2498，泰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碧雅娜 · 汶纳：《泰国现代史：从鲍令条约到
“1973 年 10 月 14 日 事件”》，统一设计出
版社，2007 年。

尊拉琪 · 钦万诺：《三十年泰中建交良友间合作情
谊 1975-2005》，川频出版社，2005 年。

ABSTRACT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in 1955 and Thai-Sino Relation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held in Bandung Indonesia in 1955 focusing on Thai-Sino relation development. This Conference actually provided Thailand and China a good occasion to discuss directly and understand each other. Certainly, this has bettered Thai-Sino relation. However, due to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power in Thailand, the con-China policy was carried out again. Thai-Sino relation that seemed getting better had to be ceased temporarily. On the basis of the related research papers, the writer has attempted to make this article get ahead of and different from others. Thus, not only has the writer used Chinese historical primary sources, but also has employed some related historical archives seldom quoted by others from the archive library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ailand.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 of those archives, the writer has raised some new viewpoints to make the research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perfection.